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国家と歴史

——戦後日本の歴史問題

国家与历史  
——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

〔日〕波多野澄雄 / 著 马静 / 译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国家と歴史  
—戦後日本の歴史問題

# 国家与历史

## ——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

---

〔日〕波多野澄雄 著  
马 静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 / (日) 波多野澄雄著；马静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2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201 - 0041 - 0

I. ①国… II. ①波… ②马… III. ①日本 - 现代史 - 研究 IV. ①K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178 号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 国家与历史

——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

---

著 者 / [日] 波多野澄雄

译 者 / 马 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碧姍

责任编辑 / 赵 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18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041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6 - 612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

KOKKA TO REKISHI

By Sumio HATA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Copyright © 2011 by Sumio HATAN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关系中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中日邦

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在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对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知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论，



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对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 前 言

我父亲虽然不是士官，却转战于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等地，终战的第二年才得以复员。在整整六年的战争岁月中，同父异母的兄弟战死沙场，父亲也成了遗族家属。他很少谈及自己的从战经历，辞退了所有的公职守护着家业，却频繁地参加战友会和日本遗族会组织的各种集会，算得上是典型的旧式军人。

对父亲而言，那场战争既不是“太平洋战争”，也不是“亚太战争”，而是一场以大东亚为舞台、按照“圣意”转战各地的“大东亚战争”。不时来访的战友们相逢固然欢喜，然而话题一涉及早早死去的战友，相信每个人心底浮现出的不是“大东亚战争”为何会以失败告终这一疑问，而是对为何要远渡重洋转战于亚洲各国，为了这场战争不惜献出生命这一问题深刻的质疑。

战后的日本，是否对这一质疑做出了充分的应答呢？换言之，政府是如何总结这场战争，又对其功过做出了哪些说明呢？

进言之，政府是如何清算战争，又是如何应对战争留下的“负面遗产”的呢？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呢？如果说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玩弄手腕，那么其原因究竟在哪里？作为一个要最大限度保障不同历史观的国家，政府应该对历史认识“介入”到何种程度呢？

另外，为了形成国民一致的历史认识即公共记忆，又需要哪些

东西呢？应该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的历史呢？

日本战败的同时，也意味着“殖民地国家”的瓦解。因此，对“大东亚战争”的清算，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的清算。那么这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本书基于作者或多或少参与过的几项政府资助项目的经验，试着来思考这些问题。

注记原则上采用当时的职位，省略敬称。

## 序章 战争总结的挫折

### 一亿人的集体忏悔还是领导人的责任？

战败后大约一个月，也就是1945年9月12日，东久迩宫稔彦内阁决议后提出了审判日本人战争犯罪的“自主审判”这一构想。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前与美国的交涉中，自主审判也是其最为重视的接受条件之一。然而，联合国最终未能承认原本意义上的自主审判。

内阁会议提出的自主审判，并非由日本单方面指定战犯嫌疑人而加以诉讼，而是针对联合国列为对象的嫌疑人进行“公正的审判”。即使这场自主审判并不彻底，天皇却认为“以天皇名义不忍心处决”为天皇尽忠的负责人，要求重新考量，内务大臣木户幸一也担心引起“同族血肉相残”而表示反对（永井均《关于战争犯罪人的政府声明案》）。

在这种局势下，有一名首脑人物始终坚持日本在战败后应该立即自主肩负的政治课题即为战争责任和自主审判。此人就是外交大臣重光葵。

出身于皇族的东久迩宫首相在战败处理问题上，并没有轻视战争责任这一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战争责任应由全体国民来共同承

担。东久迩宫一方面派遣副首相级别的内阁成员近卫文麿作为“谢罪使节”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又起用基督教社会活动家贺川丰彦作为内阁参议，寄希望于基督教徒能够“重建道义”。这些举措都源自于他认为，战前、战争期间日军的非法野蛮行径都是由全体国民对敌国人民的“憎恶”和偏见引起的。战败后不久的8月28日，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全体国民集体忏悔论”就产生于这种观点之上。

然而，外交大臣重光却对“集体忏悔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程度不尽相同，但是以前的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皇室和国民应该受到拥护。由此，重光赞同由日本来进行自主审判的构想。紧接着，他便向东久迩宫提出宏大的改革方案，即重组内阁，任命未参与战争的局长级的“新进之士”来担任内阁成员（伊藤隆等编《续 重光葵手记》）。

东久迩宫下定决心要接受重光的提议，却遭到了内阁的激烈反对，最后内务大臣木户建议取消改革方案，9月17日，重光独自退出内阁。究其原因，在于对待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观点和处理方式的不同。重光心中对领导人战争责任严肃追究的态度，和东久迩宫等人的皇室、国民拥护论，与如何看待战败的意义这一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重光的下台意味着政府在严肃追究领导人责任态度上的后退。继东久迩宫内阁之后，币原喜重郎于1945年10月重新组阁，11月5日，内阁通过了《关于战争责任等事项》的决议。其内容为，天皇尽心于和平解决与美国的交涉问题，天皇的参与不过是遵照宪法运用上确立已久的惯例而已，无权否决大本营和政府的决定事项，再次确认了拥护天皇的观点，未能涉及战争领导人的责任。

另外，在币原内阁通过上述决议后，不久又召开了第89届帝国议会，战争责任问题成为焦点。

## 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的成立

9月上旬召开的第88届帝国议会仅仅历时两天就宣布结束，实际上，11月底召开的第89届帝国议会是战败后首次召开的帝国议会。

这次的帝国议会上，提出了关于战争责任的两份决议文案。一份是日本自由党提出的《关于议员战争责任的决议案》，另一份是日本进步党提出的《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案》。两者都瞄准了将要在新出台的选举法下实施的众议院选举，与其想要借机扩大政党的势力密切相关。

最后，在12月1日召开的众议院全体大会上，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所谓“官选议员”占了大半数的进步党以人数取胜，该党的方案获得了通过。进步党的方案将追究“战败原因”放在首位，仅仅要求追随了“军阀官僚专横”的议员们“自我反省”，在检讨议员战争责任问题上比自由党的方案更为倒退。对此，《读卖报知》（12月4日）评论其为“无良心的决议案”。

而与此同时，日本试图成立由自身来总结战争的机构。币原在第89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大东亚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真相，宣布为了今后不再重蹈“重大的过失”，在内阁部门内成立“大东亚战争调查会”。

大东亚战争调查会在10月30日以《战败的原因及真相调查一事》为名通过了内阁的决议（功刀俊洋《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的战争责任观》）。正如其名，调查的目的在于“找出战败的原因以及真相，是为了将来不再重复这种重大过失”，文案中原有的“督促我国国民反省”的字句被内阁决议删除。这表明了政府内外追究领导人战争责任的呼声，不允许将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全体忏悔论”这一模糊的概念上。然而，调查会成立的目的并非是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按照币原和次田大三郎内阁书记长官的意图，调查虽然溯及满

洲事变<sup>①</sup>前后，却并非要将调查结果作为追究责任的根据。他们有意把调查结果的判断托付给“健全的舆论”，最终由被视作“责任人”的每个领导人来自主判断自己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要比有可能引发国内矛盾的“国内审判”更加有效。

11月22日公布和实施的调查会官制中，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其全面的行政职能。长官（敕任官）下设24名调查官（奏任官），31名专职人员（判任官）以及15名以内由学者担任的参议（敕任官待遇），形成了最多可达70人的调查规模。调查官多为企划院和兴亚院等拥有国策立案经验的官僚（多数是所谓的“革新官僚”），以他们为中心，12月开始实施机构整顿和事先调查。

12月底，次田的友人、出身于财务省的青木得三被任命为事务局长官，接下来是总裁人选的问题。币原原本看好了“满洲事变”时协助压制军部的牧野伸显（当时任内务大臣）和若槻礼次郎（当时任首相），两人均严词拒绝。总裁的候补人选还有野村吉三郎和安部矶雄等人，1946年后最终由币原本人兼任总裁。同时，大东亚战争调查会也于1月改名为战争调查会。

调查委员会的人选成为下一个难题。委员一共25名，任期3年，可见调查持续的时期很长。最终选定了20名委员，名单如表1所示。此外，各部委的副长官任临时委员，而且，以当时陆海军部的后继机构第一、第二复员部为中心，旧军人开始进行战争调查，由于调查的关系，原中将宫崎周一（终战时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等军人也加入成为临时委员。

1946年3月下旬，战争调查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币原在致辞中表示，“要使其成为后世能够让国民信服的强有力的机构”。在这次大会上，加入了左右调查会方针的新元素，即3月上旬宪法修改案公布并宣布“放弃战争”。

<sup>①</sup> 即九一八事变，本书以下凡涉及满洲问题，均采用当时用法，不另注。——译者注



表1 战争调查会构成人员（1946年3月27日第一次全体大会时）

总裁	币原喜重郎（首相）
委员	阿部真之助（前东京《日日新闻》主笔）、有泽广己（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汀利得（原中外商业新报社社长）、大内兵卫（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河内辉耕（贵族院议员）、片山哲（日本社会党）、木村介次（藤仓电线研究部长）、斋藤隆夫（众议院议员）、柴田雄次（名古屋大学化学教授）、铃木文史朗（大阪《朝日新闻》董事）、高木八尺（东京大学美国政治史教授）、富冢清（东京大学电气工学教授）、中村孝也（东京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马场恒吾（读卖新闻社社长）、松村义一（贵族院议员）、八木秀次（大阪大学总长、前技术院总裁）、山室宗文（三菱信托会长）、渡边几治郎（历史学家）、渡边鍊藏（原日本商工会议所专务理事、后任东宝社长）、和辻哲郎（东京大学哲学教授）

注：职务以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为基准。大内兵卫当时未入内阁。

资料来源：《币原文库》收藏资料，《朝日年鉴》（1946）。

## 迷失方向的调查方针——为了什么？目标在哪？

战争调查会全体大会上还提出了一个议题，区别于币原和次田的考虑，人们关心的是为何要“找出战败的原因以及真相”，以及它的目标所在。倘若具体调查要由各个部门来实施的话，就必须达成统一理解和一致意见。

其中，渡边鍊藏就主张，为防止真正的战争责任者（军部的中坚幕僚层）被豁免或是减刑，应该彻底调查开战原因并锁定真正的责任者。

然而，币原却在追究责任方面持消极态度，他只是反复强调，“过错是由自身认识到并加以反省的”（前引功刀论文）。

马场恒吾则认为，既然已经把放弃战争写入了宪法草案，那么与其对战败原因和战争责任等进行独自调查，还不如通过研究开战原因来追究战争本身的意义和放弃战争是否妥当更为有效。马场的意见是应将追究战争责任者一事托付给联合国，日本则转向调查研究如何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